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魏晋玄学

卞敏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 组编

魏晋玄学

卞敏 著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玄学/卞敏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7-305-06273-5

I. 魏… II. 卞… III. 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
时代 IV. B23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9674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书 名 魏晋玄学

著 者 卞 敏

责任编辑 李廷斌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4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273-5

定 价 19.5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论 魏晋玄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1
第一章 魏晋玄学的时代背景	19
1. 社会:从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	20
2. 阶层:从党锢之祸到清流气节	31
3. 政治:从政治动乱到名教危机	40
第二章 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	52
1. 学脉: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53
2. 学理:从才性清议到玄理清谈	63
3. 学术:从儒道冲突到思想融合	74
第三章 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	87
1. 有无之辨:存在与本体	88
2. 情礼之辨:自然与名教	100
3. 群己之辨:个体与社会	115
第四章 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	126
1. 老玄:以老解玄	127
2. 庄玄:以庄解玄	134

3. 儒玄:以儒解玄	145
4. 佛玄:以佛解玄	151
第五章 魏晋玄学的哲学意识	161
1. 自然:崇尚自然	162
2. 自觉:人性自觉	169
3. 自主:人格自主	176
4. 自由:精神自由	183
第六章 魏晋玄学的思辨方法	190
1. 名理之辨:辨名析理	191
2. 言意之辨:得意忘言	197
3. 本末之辨:崇本息末	204
第七章 魏晋玄学的人生思考	212
1. 气质:魏晋风度	213
2. 生命:生死忧患	220
3. 心灵:逍遥自适	227
4. 境界:理想人格	233
第八章 魏晋玄学的审美趣味	240
1. 纯朴:纯美生命	241
2. 悲情:以悲为美	247
3. 清美:自然清丽	255
4. 品位:审美情调	260

第九章 魏晋玄学的创新精神·····	266
1. 反思:批判意识·····	267
2. 智慧:独立价值·····	274
3. 思辨:抽象思维·····	281
4. 超越:人文精神·····	287
第十章 魏晋玄学的文学风格·····	295
1. 神韵:《文心雕龙》的玄思·····	296
2. 飘逸:从游仙诗到玄言诗·····	300
3. 恬淡:从山水诗到田园诗·····	305
4. 幽雅:玄远中的艺术精神·····	315
主要参考文献·····	323

导论

魏晋玄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这同样适用于思想史的研究。注重于“当代”的思想史研究的意义，在于研究本身并不是为了针对过去抒发思古之悠情，而是更多地着眼于现在与将来的“问题”意识。如果说思想史研究是一种思想创造的活动，是捕捉古人的思想，重建古代思想的流程，那么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要在研究者自己的心灵中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因此，研究者对于古代思想的解读，并不是消极地委身于古人心灵的魅力，而是一项积极的、批判性思维的工作。任何从思想史解读中获得的认识，都涵摄着研究者的思想成分在内。作为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实际上是在活着的心灵与古人的思想“对话”中的一种认识。

一般说来，学术研究有价值的进展都是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开始的。纵观学术思想史，每当历史的进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都有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理论热点问题出现，从而使学术思想的发展线索呈现出阶段性。现在，学术界通常都

把中国传统学术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将魏晋玄学定格为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与近代学者章太炎、刘师培最先恢复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不无关系。刘师培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待进一步研讨,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他撰成于1917年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作为在北京大学讲课时的讲义,虽不是研究魏晋玄学的专著,却是研究魏晋学术思想的精品。对此,甚至对刘师培人品略有微词的鲁迅先生对此书的学术成就也很赞赏。鲁迅在其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中评价这本书时说:“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并说:“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而已集》)

中国历史自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末的四百年之间,史家称之为“魏晋南北朝”,此时社会思潮的主流是“玄学”。这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然而,在中国学术界直至20世纪初,魏晋玄学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致梁启超以“老学时代”概括魏晋学术思潮,误认为魏晋时期“实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当时学者们对魏晋玄学的茫然无知由此可窥见一斑。章太炎的《五朝学》等是较早研究魏晋玄学的论著,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功效,其友刘师培受他的影响,在《国学发微》、《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等论著中对魏晋玄学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对近代魏晋玄学研究也有筚路蓝缕之功。而后鲁迅

整理《嵇康集》、汤用彤著《魏晋玄学论稿》、刘大杰著《魏晋思想论》，及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等，都对魏晋玄学研究大有裨益。魏晋玄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在近代蔚为大观，无不受章太炎、刘师培的影响。

具体地说，当代学者对魏晋玄学的研究是逐步深入的。在这里，首先要特别提及的是汤用彤先生的研究成果。汤先生以其深厚的西方哲学素养，将魏晋玄学建构为一种以本末有无之辨为中心的形上学，并确立起一种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他在1938~1947年10年间陆续写成的9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除《言意之辨》外，都发表在当时的《学术季刊》、《哲学评论》、《大公报·文史周刊》等报刊上，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诸多学术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构建了魏晋玄学的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用力最勤。他认为，汉魏之际的形名学与《易》学天道观的演变，是玄学形成的两大思想来源；“言意之辨”是玄学的新方法；王弼玄学标志着中国哲学从“宇宙构成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向秀与郭象《庄子注》的思想特质是以“儒道为一”；道生的“顿悟”说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此外，对魏晋玄学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佛教影响，以及魏晋玄学的主要发展阶段也提出了独到见解。其中，关于玄学的特质是以本体论“体用”方法融合儒道的观点，对20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基本思路的影响极大。

如果说汤用彤先生是侧重于对魏晋玄学作哲学理念的分析，那么，以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为代表的史学家于解放前

后发表的论文,则为魏晋玄学史的研究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背景。例如,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论文集中,对魏末“四本论”蕴含的特殊政治意义、玄学名士的人格特征、竹林七贤称谓的由来、两晋之际玄学与佛教的关系等,都提出诸多独到见解,尤其是关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成一家之言,并产生深远影响。又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在清议与清谈关系、魏晋才性论、魏晋玄学思潮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上,也不乏真知灼见。

建国初期的20世纪50、60年代,学术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魏晋玄学研究领域,并产生别开生面的效果,其代表作是先后出版的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以及各种报刊发表的数十篇论文。这些论著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玄学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阶级属性,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庄园经济、门阀士族,予以了更多的关注;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玄学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人性论、历史观的研究也有新的角度。此外,还发掘了以往研究者所忽视的思想家,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对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嵇康,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发前人所未发。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对魏晋玄学的评价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魏晋玄学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学者们以历史主义的眼光重新考察汉魏之际的学术变革,充分肯定魏晋玄学在当时的思想解放意义。从研究方向看,新时期成果的学术特点是专题化倾向。大陆出版的玄学通史性著作,主要有许抗生等合著的《魏晋玄学史》(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8年版)、孔繁的《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余敦康的《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少数几种。在中国哲学通史类著作中,有关魏晋分册对玄学所作的整体性论述,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堪称代表作。另一方面,学者们对玄学史上各个断代、流派、人物或文化现象予以更多关注,使许多专题性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的丰富发展前人成说,有的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关于魏晋玄学各个流派的研究方面,正始玄学有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全面系统的文献整理,王葆玟《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78年版)历史考证较为翔实,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齐鲁书社1991年版)哲理分析深刻;竹林玄学有高晨阳《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哲学角度作系统的学理剖析,张节末《嵇康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嵇康美学作别开生面的分析;西晋玄学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堪称新时期代表作,卢国龙《郭象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有不少睿智的闪光点;东晋玄学马良怀《张湛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提出传主二元论哲学的学术创见。

关于玄学与魏晋思想文化的关系,玄学与儒、释、道关系方面,许抗生的《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版)是最早关注这一课题的专著;洪修平的《玄学与禅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多有真知灼见。在玄学与文学方

面,孔繁的《魏晋玄学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从哲学角度探讨这一课题。在魏晋风度及士人心态方面,马良怀的《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与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分析细致,各成一家之言。康中乾的《有无之辨——魏晋玄学本体思想再解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以有无之辨为线索对魏晋玄学本体论思想作出综合性研究。除上述专著外,这个时期许多论文的学术含量也同样令人瞩目。

分门别类的科学理性分析方法,使思想史的研究日益系统化、条理化。然而,由于传统的学科条块分割,魏晋玄学研究通常还被局限在狭窄的哲学史学科中。学者们选取资料,往往到玄学家的哲学著作中去寻找,偏重于有形的理论学说,忽略了无形的社会心态层面,而后者实际上是前者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对于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过程来说,两者缺一不可。文学艺术史和宗教史的大量史料、生动活泼的诗赋小说传奇等,其中蕴含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应忽视。因此,如果将魏晋玄学思潮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发展空间中,打破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宗教、文化、社会等学科障碍,全面梳理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吸取与玄学相关的内容,或许能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细节,感受到更微妙的社会心态变化。思想史研究面对的是历史的心灵。我们不仅须要着重研究那些有思想创见的哲学家的学说,更应当关注那个时代的一切精神现象,将理论学说变迁与时代精神演进融为一体,才能进入再现魏晋历史文化生命的学术境界。

运用专门的思想史方法,将玄学与儒、释、道的关系,与先秦诸子、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关系,进行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研究,以凸现玄学的理论特质,探索新的研究理路,应当说是一条必不可少的学术路径。其中,关于玄学与儒、释、道的关系问题或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果以汤用彤先生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魏晋玄学研究的系列论文为代表,海内外学术界在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些共识。然而,近年来关于儒释道与玄学的关系,又重新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课题。比如,渊源于汉魏孔氏家学的王肃经学,作为魏晋儒学代表是这一时期的官方哲学,而王肃《易》学是王弼《易》学的思想资源之一。又如,对于早期玄学来说,黄老之学可能是比老庄哲学更直接的一个思想来源,等等。经学与玄学、黄老之学与玄学的关系,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参阅王晓毅著:《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 年第 2 期)

按照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魏晋分册中的说法,“‘玄学’是一个时代思潮的名称,并不是一个哲学派别的名称”。不管如何理解,玄学是流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主要哲学思潮,这是没有问题的。“玄学”这一名称的使用大约在西晋年间,梁朝沈约称:“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立玄学。”(《宋书·雷次宗传》)这可能是古代文献中对“玄学”这一概念的最早记载。如何理解“玄学”这一概念?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说文解字》指出“玄,幽远也”,《世说新语》概括为“玄远之学”,即玄妙深奥的学问。例如,《世说新语·规箴》篇说:“王夷甫雅尚玄远。”这是赞叹王

行的情趣高雅,不留意纷繁世事。《世说新语·文学》篇又说:“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这里的“玄远”,不单是一种情趣,而且表明荀粲的论谈超脱具体物象,趋向于思辨。于是,“玄学”衍生为“才性”、“玄理”两系。这说明魏晋名士大多希企达到“无”的精神境界,当时称之为“玄远”。第二种意见认为,玄学名称来自《老子》的“玄”。从《道德经》开始,引“玄”为哲学之用。《老子》首章称“道”曰“玄”,“玄”即形上之道。“玄”作为哲学概念,在《老子》中频繁出现,例如“玄牝”、“玄同”、“玄德”等。老子论“道”之高、深、幽、远,“同谓之玄,玄之又玄”。(《老子》第一章)《庄子·天地》篇讲“玄德”,《天道》篇讲“玄圣”。王弼解释“玄”字说:“玄者,冥默无有也。”(《老子注》第一章)冥,有昏暗看不见的意义;默,意即说不出、无法形容。老子之“道”超越事物的具体形象,人们既感知不到又无法形容,只得用一个“玄”字来表示。从魏何晏、王弼开始用老庄思想讲《易》,《周易》与《老子》、《庄子》并称“三玄”,玄学盛极一时。第三种意见认为,玄学是“以道排儒”的哲学思潮。魏晋玄学之为“玄学”,有其特定的含义。作为对两汉儒教经学的否定,玄学是从魏正始年间开始兴起的崇尚老庄道家学说的一种哲学思潮。当时的文人雅士好作“清谈”、“清言”,立论深远玄奥,以此拯救混乱现实,重建理想社会。

魏晋玄学研究范围极广,要给玄学下一个定义相当困难。关于什么是玄学的界定,还可以从玄学研究对象上加以概括。例如,从玄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注释对象,可称为“三玄”之学;从把老庄哲学中的“有无”问题当做探讨

的中心课题,以探究世界本体为其哲学的基本内容,可称为讨论宇宙本体的“玄远”之学;从以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哲学目的,其主旨在于探求理想人格来说,可称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学问,如此等等。汤一介先生在《郭象与魏晋玄学》中综合上述诸点指出:“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所讨论的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用思辨的方法来讨论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表现为远离‘世务’和‘事物’形而上学本体论的问题。”与何谓玄学的问题相关联,玄学家们大体用两种方式表达其观点:一种是以道家观点解说儒家典籍,如何晏的《论语集解》;另一种是以儒家学说阐发道家著述,如郭象的《庄子注》等。从谈玄途径看,玄学家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文人玄学家,如前述两种解说古代经典者;第二类是口头谈玄者,这类人在魏晋南朝士大夫中很多;第三类是既谈玄理又写玄言诗文者,如阮籍、嵇康、刘伶等人。

和汉代经学不同,玄学别开生面,风格迥异。对魏晋玄学学术派别归属问题历来争议颇多,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为儒道互补说,认为魏晋玄学是儒道调和、杂融,主张以儒道会通来界定玄学,这种观点以汤用彤先生为代表;第二种为儒家主体说,认为玄学属于明道暗儒,实质是以儒融道,即以儒家为本、为体,以道家为末、为用,这种观点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第三种为道家主体说,认为玄学是兼融儒、释及诸子之学的“新道家”思潮,这种观点以冯友兰先生为代表。三种观点貌似三家之言,其共同点是把儒道区分为两种根本不同的

哲学传统,问题在于:一,把儒道两家学派分野看得过于绝对化,而儒道两家本质上是对立统一关系;二,把本末、体用划分等同于高低、贵贱的价值划分;三,玄学是新道家学派的观点,建立在两个潜在前提的基础上。一方面,魏晋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因此玄学更重视道家。严格地说,“三玄”不是玄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玄学家注释的经典,是思想资源、理论前提。另一方面,玄学家对礼乐名教进行批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直接向名教挑战。名教原指儒家“因名设教”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至魏晋时“名教”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从根本上说,魏晋玄学是儒家道学化、道家儒学化的互动过程。正确剖析儒道学术的相互关系,是解决魏晋玄学派别归属问题之关键。

关于玄学有无理论主题,主题是什么的问题,学界意见也不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思想多元化的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是非常普遍的,玄学主题也相应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如果对魏晋玄学作一种整体性把握,那么玄学主题的各种不同理解是可以互补的。一种看法认为,玄学无主题可言,因为其理论内涵博大精深,若限定任何一种主题,都会给玄学研究带来局限性;另一种看法认为,玄学博大精深并不妨碍其理论主题的客观存在,探讨主题能加深玄学的研究。具体地说,从哲学角度看,“有与无”关系是主题,即由神秘的天命论转向人的自然本性,思维方式从宇宙生成论转向本体论;从政治角度看,“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主题,玄学为挽救名教而援道人儒,为儒学纲常重构新的价值体系;从时代精神看,玄学破除思想僵化,“超越精神”是主题,带来人的觉醒;从士大夫阶层

关注的问题看,玄学主题是如何重新确立人生价值。玄学的产生以忧患意识为动力,表面看似有清谈虚空之痼疾,实质上是一次思想解放。

从学理上说,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关系与“有无”关系处于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是玄学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问题,后者是玄学在哲学领域中的问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玄学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在哲学领域中,玄学则以“有无之辨”为主题。魏晋玄学之所以称为玄学,之所以区别于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其根本标志是继承和发展先秦道家以来的哲学有无之辨,讨论形上之“无”与形下之“有”的关系问题。至于“名教与自然”,实质上是儒家名教(名分等级的礼义教化)的有为之治与道家顺应自然的无为之治的关系问题。在历史上,人们通常是把这两者作为根本对立的政治主张看待。魏晋玄学的兴起,总结汉代儒家名教之治失败的经验教训,研讨名教(有为)与自然(无为)关系问题,希望能把两者统一起来,以挽救汉末以来的名教之弊。

关于魏晋玄学的价值评价与功过是非,在以儒家为正统观念的思想家看来,玄学是老庄的复活、儒学的异端。玄学不仅在当时遭到“反玄学”思想的抵制,被时人斥为“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晋书·裴頠传》),而且在后代一直被等同于老庄之学。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说,玄学即是老庄之学,老庄之学目的在于“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己”。玄学家们“清谈雅论,剖玄析微”,不过是“娱心悦耳”的工具,“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晋书·儒林传序》批评说:“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